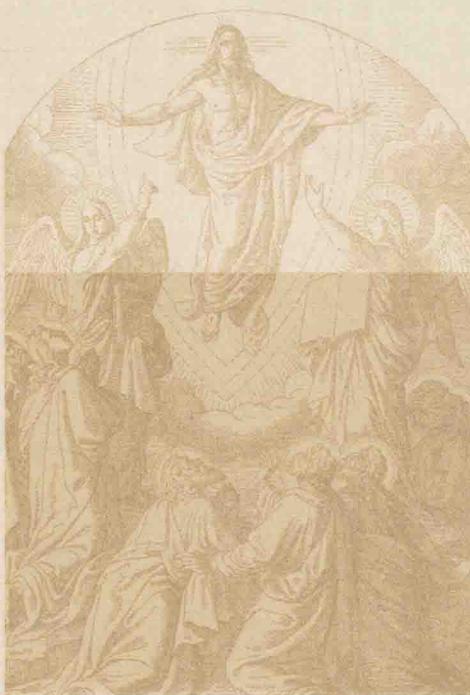


基督教经典译丛



John Bunyan

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

丰盛的恩典

【英】约翰·班扬 著 苏欲晓 译





何光沪 主编

副主编 章雪富 孙毅 游冠辉

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

丰盛的恩典

【英】约翰·班扬 著 苏欲晓 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丰盛的恩典 / (英) 班扬 (Bunyan, J.) 著；苏欲晓译；何光沪主编。—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0
(基督教经典译丛)
ISBN 978 - 7 - 108 - 05080 - 9

I. ①丰… II. ①班… ②苏… ③何… III. ①班扬,
J. (1628~1688) —自传 IV. ① B979.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2127 号

丛书策划 橡树文字工作室
特约编辑 刘 峭
责任编辑 鲍 准 张艳华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9.75
字 数 259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33.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基督教经典译丛

总序

何光沪

在当今的全球时代，“文明的冲突”会造成文明的毁灭，因为由之引起的无限战争，意味着人类、动物、植物和整个地球的浩劫。而“文明的交流”则带来文明的更新，因为由之导向的文明和谐，意味着各文明自身的新陈代谢、各文明之间的取长补短、全世界文明的和平共处以及全人类文化的繁荣新生。

“文明的交流”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乃是对不同文明或文化经典之翻译。就中西两大文明而言，从17世纪初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为首的传教士开始把儒家经典译为西文，到19世纪末宗教学创始人、英籍德裔学术大师缪勒（F. M. Müller）编辑出版五十卷《东方圣书集》，包括儒教、道教和佛教等宗教经典在内的中华文明成果，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西方各国；从徐光启到严复等中国学者、从林乐知（Y. J. Allen）到傅兰雅（John Fryer）等西方学者开始把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译为中文，直到20世纪末叶，商务印书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其他有历史眼光的中国出版社组织翻译西方的哲学、历史、文学和其他学科著作，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社科书籍也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这些翻译出版活动，不但促进了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的双向“文明交流”，而且催化了中华文明的新陈代谢，以及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清末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取长补短”的历程，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的主导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表现为洋务运动之向往“船坚炮利”，追求“富国强兵”，最多只求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和

物质文明，结果是以优势的海军败于日本，以军事的失败表现出制度的失败。第二阶段的主导思想是“民主加科学”，表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尊崇“德赛二先生”，中国社会在几乎一个世纪中不断从革命走向革命之后，到现在仍然需要进行民主政治的建设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大体说来，这两大阶段显示出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十分肤浅到较为深入，有了第一次深化，从物质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

正如观察一支球队，不能光看其体力、技术，还要研究其组织、战略，更要探究其精神、品格。同样地，观察西方文明，不能光看其工业、技术，还要研究其社会、政治，更要探究其精神、灵性。因为任何文明都包含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不可分割的层面，舍其一则不能得其究竟。正由于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到了20世纪末叶，中国终于有了一些有历史眼光的学者、译者和出版者，开始翻译出版西方文明精神层面的核心——基督教方面的著作，从而开启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较为深入到更加深入的第二次深化，从制度层面深入到精神层面。

与此相关，第一阶段的翻译是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书籍为主，第二阶段的翻译是以社会科学和人文书籍为主，而第三阶段的翻译，虽然开始不久，但已深入到西方文明的核心，有了一些基督教方面的著作。

实际上，基督教对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影响，绝不止于西方文明。无数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家、科学史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已经证明，基督教两千年来，从东方走向西方再走向南方，已经极大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社会从上古时代沿袭下来的对生命的价值、两性和妇女、博爱和慈善、保健和教育、劳动和经济、科学和学术、自由和正义、法律和政治、文学和艺术等等几乎所有生活领域的观念，从而塑造了今日世界的面貌。这个诞生于亚洲或“东方”，传入了欧洲或“西方”，再传入亚、非、拉美或“南方”的世界第一大宗教，现在因为信众大部分在发展中国家，被称为“南方宗教”。但是，它本来就不属于任何一“方”——由于今日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

家没有其存在，所以它已经不仅仅在宗教意义上，而且是在现实意义上展现了它“普世宗教”的本质。

因此，对基督教经典的翻译，其意义早已不止于“西学”研究或对西方文明研究的需要，而早已在于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了解的需要了。

这里所谓“基督教经典”，同结集为“大藏经”的佛教经典和结集为“道藏”的道教经典相类似，是指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而不是指基督徒视为唯一神圣的上帝启示“圣经”。但是，由于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绝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佛藏道藏那样结集为一套“大丛书”，所以，在此所谓“经典译丛”，最多只能奢望成为比佛藏道藏的部头小很多很多的一套丛书。

然而，说它的重要性不会“小很多很多”，却并非奢望。远的不说，只看看我们的近邻，被称为“翻译大国”的日本和韩国——这两个曾经拜中国文化为师的国家，由于体现为“即时而大量翻译西方著作”的谦虚好学精神，一先一后地在文化上加强新陈代谢、大力吐故纳新，从而迈进了亚洲甚至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行列。众所周知，日本在“脱亚入欧”的口号下，韩国在其人口中基督徒比例迅猛增长的情况下，反而比我国更多更好地保存了东方传统或儒家文化的精粹，而且不是仅仅保存在书本里，而是保存在生活中。这一事实，加上海内外华人基督徒保留优秀传统道德的大量事实，都表明基督教与儒家的优秀传统可以相辅相成，这实在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基督教在唐朝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中国，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率宫廷卫队到京城西郊欢迎传教士阿罗本主教，接到皇帝的书房让其翻译圣经，又接到皇宫内室听其传讲教义，“深知正真，特令传授”。三年之后（公元638年），太宗又发布诏书说：“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换言之，唐太宗经过研究，肯定基督教对社会具有有益的作用，对人生具有积极的意义，遂下

令让其在全国传播（他甚至命令有关部门在京城建造教堂，设立神职，颁赐肖像给教堂以示支持）。这无疑显示出这位大政治家超常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一千多年之后，在这个问题上，一位对中国文化和社会贡献极大的翻译家严复，也显示了同样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他在主张发展科学教育、清除“宗教流毒”的同时，指出宗教随社会进步程度而有高低之别，认为基督教对中国民众教化大有好处：“教者，随群演之浅深为高下，而常有以扶民性之偏。今假景教大行于此土，其能取吾人之缺点而补苴之，殆无疑义。且吾国小民之众，往往自有生以来，未受一言之德育。一旦有人焉，临以帝天之神，时为耳提而面命，使知人理之要，存于相爱而不欺，此于教化，岂曰小补！”（孟德斯鸠《法意》第十九章十八节译者按语。）另外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即胡适之和陈独秀，都不是基督徒，而且也批判宗教，但他们又都同时认为，耶稣的人格精神和道德改革对中国社会有益，宜于在中国推广（胡适：《基督教与中国》；陈独秀：《致〈新青年〉读者》）。

当然，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译丛，首先是想对我国的“西学”研究、人文学术和宗教学术研究提供资料。鉴于上述理由，我们也希望这项工作对于中西文明的交流有所贡献；还希望通过西方文明精神认识的深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更新和中国社会的进步有所贡献；更希望本着中国传统中谦虚好学、从善如流、生生不已的精神，通过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中基督教精神动力的了解，对于当今道德滑坡严重、精神文化堪忧的现状有所补益。

尽管近年来翻译界出版界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在这方面艰辛努力，完成了一些极有意义的工作，泽及后人，令人钦佩。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千年古国和文化大国来说，已经完成的工作与这么巨大的历史性需要相比，真好比杯水车薪，还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即使以最严格的“经典”标准缩小译介规模，这么一个文化大国，竟然连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举世皆知的千年巨著《神学大全》和加尔文（John

Calvin) 影响历史的世界经典《基督教要义》，都尚未翻译出版，这无论如何是令人汗颜的。总之，在这方面，国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本译丛的翻译出版，就是想以我们这微薄的努力，踏上这漫长的旅程，并与诸多同道一起，参与和推动中华文化更新的大业。

最后，我们应向读者交代一下这套译丛的几点设想。

第一，译丛的选书，兼顾学术性、文化性与可读性。即从神学、哲学、史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学术角度出发，考虑有关经典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上的影响，顾及不同职业、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选择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

第二，译丛的读者，包括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科学院和各级各类人文社科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高等学校哲学、宗教、人文、社科院系的学者师生，中央到地方各级统战部门的官员和研究人员，各级党校相关教员和有关课程学员，各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官员和研究人员，以及各宗教的教职员、一般信众和普通读者。

第三，译丛的内容，涵盖公元 1 世纪基督教产生至今所有的历史时期。包含古代时期（1—6 世纪）、中古时期（6—16 世纪）和现代时期（16—20 世纪）三大部分。三个时期的起讫年代与通常按政治事件划分历史时期的起讫年代略有出入，这是由于思想史自身的某些特征，特别是基督教思想史的发展特征所致。例如，政治史的古代时期与中古时期以西罗马帝国灭亡为界，中古时期与现代时期（或近代时期）以 17 世纪英国革命为界；但是，基督教教父思想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仍持续了近百年，而英国革命的清教思想渊源则无疑应追溯到 16 世纪宗教改革。由此而有了本译丛三大部分的时期划分。这种时期划分，也可以从思想史和宗教史的角度，提醒我们注意宗教和思想因素对于世界进程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中国北京大学宣园

2008 年 11 月

天路客心灵的困境与释放

(中译本导言)

颜新恩

我的心被一种痛苦的感情折磨着。这种感情我只能称之为寻找上帝。

——列夫·托尔斯泰

上主，我的心若不安息在你的怀中，便永不安宁。

——奥古斯丁

提起《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许多人脑海中会立即出现一个栩栩如生的“天路客”形象。在欧美，对“他”的熟悉程度绝不亚于哈姆雷特，就世界范围而言，大概也是如此。据说此书已被翻译成近三百种文字，仅次于圣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的形象，每个人心中也都有自己的一个“天路客”。但两者至少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焦虑”(anxiety)。“哈姆雷特”的原型难以断定，^①与此不同，“天路客”的原型就是作者约翰·班扬(John Bunyan)，而两者更大的不同在于：哈姆雷特的精神困扰最终也没有得到安抚，“天路客”却在与受苦基督的相遇中得着心灵的安息。这本班扬的自传《罪魁蒙恩记》，就是作者的现身说法，揭秘“天路客”的“心灵历程”。

约翰·班扬由于家境贫寒，早年所受的教育非常有限，大概仅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这再次让人想起莎士比亚同样欠佳的教育背景）。不

^① 这两个主人公可能是17世纪（两部作品的具体写作年月难以确定）英国文学中最广为人知的形象。

过，班扬生逢其时，对于不会用拉丁文读写的他而言尤其如此，因为他至少拥有两个重要的英文版圣经。一本是他出生前半个世纪在瑞士出版的日内瓦圣经（Geneva, 1560），^①另一本则是于 1611 年正式在英国公开出版的钦定本圣经（King James Version）。从《天路历程》和本书以及他的讲章中广泛引用的经文可知，他非常熟悉这两版圣经。除此之外，马丁·路德的《〈加拉太书〉注释》应该就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书籍。如果说，他得到这本古书（“旧得一翻几乎就要碎了”）是个意外，那么他与这本书的“一见钟情”就绝非偶然。这本书为他打开了理解圣经的路径（尽管他不一定清楚意识到），^②路德的经验之谈也指引着他探寻解决心中愁苦的方向，并最终获得了答案。

班扬读了几页路德的书就感觉到，路德的心灵挣扎与自己类似。他们为之惶恐的是同一个问题：人如何在上帝公义的审判前站立得住？当班扬省察自身发现，^③自己的意念与言行离上帝诫命的要求实在相去甚远。虽然他也多番决心“改正”，却始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样的罪总是一犯再犯。罪咎感彻底掳掠了他的良心，他几乎再没有脸面和勇气面对上帝。难道就要如此灭亡吗？谁能拯救？路德也曾同样苦恼不堪，但他在《加拉太书》与《罗马书》中发现了上帝的拯救之道：因信称义！^④这个福音消除了他良心的纠结，他不再依靠自身的“努力改造”，

^① 英国改教者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参与推动翻译出版，加尔文为之写了八页序言。它也被称为宗教改革版圣经（The Reformation Bible），1576 年第一次在英国境内发行。这是早期说英语新教徒最广泛使用的版本，也是清教徒（五月花号）带到美国的第一本圣经。另外，它是莎剧引用的版本，也是约翰·弥尔顿所用的版本，当然包括约翰·班扬。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英语世界第一本研读版圣经（有不少驳斥天主教的段落），意在鼓励普通信徒修习，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圣经。如果说这是这本圣经塑造了班扬的圣经解释方法与神学观念，绝不夸张。

^② 指救赎教义而非解释圣经的步骤方式。

^③ 其中“言语”的罪在班扬心中非常沉重。圣经中的先知以赛亚也有同样的感受（赛 6:5）。

^④ 持保罗新观（new perspective on Paul）者当然不会同意，并认为路德以个人经验过分诠释了保罗，甚至也有认为保罗理解错了犹太教。对此，卡森博士（D. A. Carson）作了非常精彩的回应（《麦种通讯》），另外，笔者 2012 年有幸聆听马歇尔博士（Howard Marshall）在美国关于保罗新观的演讲，他从新约神学角度列出 10 条理由说明，“因信称义”不管是不是保罗神学的核心，但肯定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题目。

而“只是相信”(Sola Fide)。如果，我们留意到路德早先的神学训练背景，就会发现，他所在修会的创始人——著名教父奥古斯丁——也有相似的经历。从《忏悔录》(Confessions)中我们得知，奥氏也曾深受人性软弱之折磨。人何以去克服道德上的无力，直面上帝的审判，这成为了奥氏心中的巨大难题。在他的经验中，解决之道不是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也不是二元论(dualism)的摩尼教(Manichaeism)，而是保罗的《罗马书》13:14:披戴基督！^①这么多人从保罗著作得到启示不是偶然的。当我们考察保罗的《罗马书》第7章时，发现这位使徒也曾经是位“苦中人”(巴刻语)，几乎到了痛不欲生的地步：“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②他早已烂熟于心的旧约律法并没有消除他的罪恶感，恰恰相反，律法更使他“知罪(难逃)”，他格外的宗教热心(加1:14)^③也没有带给他内心的安宁(路德的经历如出一辙)；显然，保罗所熟知的希腊哲学也没有提供出路。他终于得着了唯一的拯救：“感谢上帝，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7:25)这正是班扬所寻求的灵魂自由，他也如先辈一样因信进入基督所应许的自由。^④

人心的焦虑在圣经中并不少见，尤其是《诗篇》，其中记录着许多个人心灵挣扎的哀叹(诗10、42、51、77)。^⑤经典的基督徒自传的特点之一，就是直面内心的痛苦，尤其是自身的罪咎引起的痛苦。在这些诗篇中，诗人在承认道德责任的同时，也进一步追问恶行的根源。诗篇的

^① 详见《忏悔录》第八卷。“披戴基督”：意指不再依靠自己，而被基督的义所遮盖。

^② 英文较好地翻译出原文：Wretched man that I am！(罗7:24,ESV)。这里上下文的“身体”，不是指生理意义上的身体，而是指人的本性。

^③ “热心”(ζηλωτής,zealot)不是指一般性的热衷于宗教生活，而是抱持一种非常激进的信念，代表性团体是法利赛派中的狂热分子——“奋锐党”(Zealotry)，他们以旧约中的非尼哈为榜样(民6:6—18)。进一步参考Steve Moyise, *Paul and Scripture: Studying the New Testament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pp. 3—5, Baker, 2010。

^④ 参《约翰福音》8:32—36。

^⑤ 连平常绝少提自己的加尔文，在《〈诗篇〉注释》前言中，也情不自禁谈起自己的心路历程。

答案不是家庭、社会、教育等，而是自己的堕落本性。大卫甚至认为自己在母亲怀胎时就有了罪（诗 51:5），奥古斯丁同样也认识到这一点（参《忏悔录》第一卷）。这不像卢梭的“忏悔”，把自己描绘成空前绝后的圣人一般，相信自己“天性本善”，充满怨气地把自己犯错的责任推给社会环境，名为忏悔，实则指控。^①虽然他的《忏悔录》常被人与奥古斯丁和托尔斯泰的《忏悔录》并称为同类题材的三大经典，但实质内容却相去万里，甚至可以说完全和奥古斯丁的忏悔或认信（confession）相反。托尔斯泰则稍胜一筹，虽然简单但深刻地描述了他在理性和道德上的真实挣扎：自己早年如何离弃基督教信仰，晚年又回归淳朴信仰。顺便一提，林语堂的精神自传《信仰之旅》与之十分相似。他们经历的更多是一种宗教思想上的纠缠，而不是罪疚感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只有班扬的自传接近奥古斯丁的主旨，尽管它缺少奥古斯丁在神学上的思辨。我们需要思考导致这个差别的关键因素何在。托尔斯泰和林语堂的上帝只是一位爱的上帝，他只会祝福不会审判，而不是像圣经所说，除了爱，他同时也是公义威严的审判者，按照律法的标准向人类问责。保罗所说的是那位“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的上帝。这不禁让人想起爱德华兹的著名讲章《落在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班扬，他的苦恼既不是无中生有，也绝非无关紧要；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耶稣救赎之“贵重恩典”。因为上帝若非公义，十字架就是廉价而矫情的。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圣经的记载清楚明了，但即使是生活在基督教传统中或研究基督教的人，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罪责上的觉醒。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忽略上帝的公义外，对自身人性的乐观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人只有深刻领略到律法的威严以

^① “我从事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我将手拿此书站在至高无上的审判者（上帝）面前……上帝啊，把我的无数同类召到我的周围吧……看看有谁敢说‘我比那人好’”。卢梭《忏悔录》上卷，第一章。

及人性无力的处境，才能领会基督救赎恩典的宝贵。《丰盛的恩典》作为传记的标题，很好地表达了班扬作为蒙恩罪人的见证。诚如他在《得救是本乎恩》这篇讲章中所引用《以弗所书》经文的作者保罗发出的感叹：“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提前 1:15—16）

把基督教视为一套道德教训与鼓励人修善自救的方法，这是对基督教最大的误解之一，尽管圣经的确满布高不可攀的道德要求（例如《马太福音》5—7 章“登山宝训”）。钟马田（Martyn Lloyd-Jones）博士说得好，这些命令是令人绝望的，为要叫人知道自己的可怜境况，唯有仰望基督的救恩。事实是，世界并不缺少行善的命令，而是缺少行善的能力。为何道德命令没有使人变得高尚？司布真生动地形容，这就像军官对着无脚的士兵发号施令（向前冲），其结果就是毫无用处。不仅如此，世界还有一个吊诡的现象：哪里满口仁义，哪里就充满假仁假义。犹太教中的法利赛人，中国的儒林都是如此。但哪里为罪悲伤呼号，哪里就有圣洁产生。班扬的经验就是最佳的见证之一。他深刻地经历了人性的挣扎以及基督的拯救，格外能体会人在道德上的无能与救恩的伟大。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何立定心志，一生宣扬“恩惠的福音”。

《得救是本乎恩》的讲章，可以说是对班扬自己信仰经验的经典解释。他首先界定“得救”（be saved）的含义——“释放”——从受罪奴役的危险处境中得到自由，也从肉体的败坏中得着解脱。他以极大的热情解释了“得救”对人而言绝对必要：人类因为犯罪都落在上帝（律法）的咒诅之下。当每一个个体意识到自己的悲惨状况，都会情不自禁地发问：我如何才能得救（徒 2:37）？这自然引出《以弗所书》2:8 的回答：得救不是出于人的努力，而完全是出自恩典！也就是说，救恩是上帝白白赐与的。他进一步指出，人因信基督得救（蒙上帝的赦免而获得天堂的门票），不是基督徒生活的终结，恰恰相反，这只是开端。基督徒应该更深经历“得救”（进入成圣）：借着恩典胜过心中的恶念与行为上的恶

行。不仅如此，更盼望在未来天国的完全得救：身体与灵魂的荣耀得赎。人最终得救后又将如何？他饶有兴味地描绘了令人向往的永恒情景，那真是一幅“好得无比”的画面！对于经历人性枷锁、世间愁苦的人而言，其安慰难以言喻。既然人的得救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这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他接着以最坚固的恩典神学——三一上帝在救恩中的作为——作了回答。他的解说，显而易见是源自《以弗所书》的神学基础。该书信第1章3—14节原文是一个句子，是新约中最长、最复杂的句子之一，其中的结构就是三一上帝的救赎工作。^①父上帝在创世以前计划了救恩，并拣选了他的子民，并差遣基督完成救赎；圣子基督甘愿顺服父上帝的旨意，降卑成为人子并为人流血牺牲，偿还罪的代价（死亡乃上帝的审判），成为人类得救的泉源，也是唯一的救法，使蒙救赎的一切生命在他里面合一，并在最后得着完全的荣耀；圣灵的来到则光照人心，使人知道自己的可怜处境，认识基督的救恩，赐与人信心，使人重生，保守人在上帝的恩典之中，并充满在人的里面，使人脱离罪性的败坏，成为圣洁。因此，在人得救方面，人没有任何的功劳。十分清楚，在三一恩典的前提下，所有人得救都是没有条件的。不过，仍然有重要的问题需要解释：为什么人需要恩典才能得救？答案还是出自《以弗所书》：因为人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被牢牢地控制在邪恶（者）的势力之下（2:1—3）。由于人在属灵上的全然败坏，在得救的事上是无能无力的，若没有上帝的救援，便没有可能得救。关切得救的人，马上会问到：我有可能领受上帝的恩典吗？这问题已经有答案（既然是恩典，就没有条件），但人不免要确认什么人可能得到上帝的救援。他继续论证到，既然得救是出于上帝的恩典，那么就不在乎人本身了。因此，最恶毒的人，离上帝最远的人，甚至多番逼迫上帝的仇敌，换言之，即使是世间

^① 详见欧白恩（Peter O'Brien）《以弗所书注释》（*The Letter to the Ephesians*），第187—192页，陈志文，潘秋松译，美国麦种传道会，Pasadena, CA。

最大的恶人也都可以得救。关于“得救是本乎恩”，似乎没有必要再说了，唯一使人担心的就是，既然一切都是恩典（包括得救的保障），那基督徒会不会因此就在属灵上毫不作为甚至胡作非为？这绝不可能！作者以“内外”两方面作出回应。一是信心，二是得救后应有的行动。关于基督徒的得救标记，^①一是依靠上帝的怜悯，认信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当然，还有“悔改的果子”。他尤其提醒读者，得救既是出自恩典，基督徒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沮丧。在应用三中，班扬提醒基督徒，得救之后应当如何。首先是感恩。如果一个人体验过陷在罪中的悲惨，又经历上帝救恩的喜乐，那么便没有理由不称颂上帝（更多是发自内心而非义务使然）。感恩，是基督徒生活最大的动力，就如保罗格外劳苦却心甘情愿，说原是“基督的爱激励”他。感恩自然地包含着爱：这份救恩我不能独占，必须向更多人分享它的好处。正如圣经所吩咐的：白白得来，白白舍去。

基督徒最惹人厌烦的事，大概是总不停向人宣扬福音，尤其考虑到福音的内容（如人的罪以及基督是唯一的拯救之类）就更是如此。不过，倘若我们能体会少许基督信仰的奥妙，也就不足为奇了。试想，如果一个人在信仰中，有了类似班扬这般刻骨铭心的经验，他如何能沉默？相反，沉默才是奇怪的。因为，如果就像作者所见证的那样，基督果真能救人脱离灵魂的折磨，那么经历过这么大的救恩的人岂能不和他人分享？诚然，不少基督徒和班扬一样热心向人宣扬福音，但只有极少数人有他的天赋才能（恩赐）。他的讲道引起轰动，甚至著名神学家、政治家、牛津大学副校长约翰·欧文（John Owen）也是他的热心听众。他饱受攻击不是因为讲道内容有何问题，而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这在当时的英格兰被视为没有讲道资格，因为无法取得国教的牧职与讲道证。国王听说

^① 这方面的讨论，爱德华兹的《宗教情感》（*Religious Affections*）也许是教会历史上最全面深刻的经典。

欧文常去听班扬讲道，就问欧文：“我不明白像你这样一个学识广博的人，为什么要去听一个从未受过教育，未受过训练的人讲道？”约翰·欧文回答道：“陛下，若我能拥有那补锅匠布道的口才能力，我宁愿放弃我的知识。”^①本书选译的这篇《得救是本乎恩》，很好地为我们展现了这位传奇讲道人的天才。他却为此遭受牢狱之灾，长达12年之久（1660—1672）。^②尽管如此，也不能使班扬放弃传道的使命。《适时的劝勉》正是为与他一样的受苦人士而写。

这篇《适时的劝勉》的讲章出自《彼得前书》的经文，这正是一封写给正为信仰缘故受试炼者的书信。使徒劝勉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在苦难中存心忍耐。一是信仰是宝贵的，值得人为它舍己；二是经过试炼的信心倍显珍贵（1:7）；三是受苦促使我们反思：为什么受苦？^③班扬警告道，基督徒受苦不都是为了义，也可能是因为自身的罪遭受上帝的责打，即违背上帝的律法和圣洁的行为。如果人不愿因作恶受苦，就不可随从诱惑犯罪；厌弃纯正的道理；嘲弄当权者或对官长动怒，因为“在上有权柄的”乃是“上帝的用人”。但有一些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首先指出，基督徒应当除去惧怕的心，“把灵魂交与上帝”。这句话的意思是，灵魂是人最宝贵的部分，基督徒无须害怕那些“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而要把灵魂交与上帝看顾保守，他必保全。因此，我们无所惧怕，一切由主做主。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基督徒不会受苦甚至被杀害。上帝的旨意包括了基督徒受苦，就如基督、先知和使徒都曾经遭遇苦难，也如福克斯（John Foxe）的《殉道史》（*The Book of Martyrs*）中所见证的。^④因此，基督徒需要预备受苦。他仔细阐述什么是“按照上帝的旨

^① <http://www.godoor.net/text/zhenli/tianlule.htm>

^② 旷世名著《天路历程》正是在此期间写成。

^③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彼前2:20）

^④ 另一部对班扬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著作。

意受苦”或说“为义受苦”。他认为有被动与主动之分。前者是非自愿的，没有选择；后者是自愿的，是自己明确的抉择。主动的情况包括人在正义与罪恶之间选择正义，通常就会遭到恶人的压迫。第二种情况是人为福音受苦。当基督徒坚持“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就很容易为此遭受苦难，甚至殉道。圣经中很多例子表明（如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这是不可避免的。他教导基督徒在此遭遇中，要学会三件事：怜悯仇敌，为其哀哭；不可心怀不平，嫉妒恶人；感谢上帝，自己竟“算配为基督的名受辱”。这是“不从国教”的英国清教徒的见证。

这本班扬选集是清教徒精神的展示。作者信仰的开启虽然受益于路德，但其思想却是不折不扣的改革宗。不过他展现出来的和所谓的新经院哲学（Neo-Scholasticism）的后加尔文主义不同，言辞间充满朝气和力量（如司布真的讲章）。当然，这不是班扬个人的宗教气质，而是那个时期英语世界的广泛灵性关切，尤其是诺克斯领导下的苏格兰。从某种角度而言，这种关切引进了17—18世纪英语世界教会广阔的复兴景象。约翰·班扬的自传验证了教会复兴史的定律：悔改先行。这个复兴对世界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毫无疑问，美国是其中一个最明显的果子。美国谚语有云，美国的好东西都是从英格兰来的，而英格兰的好东西都是从苏格兰来的。从新教的角度而言，这的确言之成理。事实上，近代宣教也大多是源于那个时期的大复兴。《得救是本乎恩》已经充分阐释了，这不是人为的，而是圣灵在人心中运行的结果；《适时的劝勉》也表明，这也不是人力可以阻挡的，而是圣灵的浪潮。